

协调发展视角下区域战略升级及空间干预策略

——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1}

罗黎平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03)

【摘要】: 通过分析区域差距、发展战略与空间干预策略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构建起一个理论分析与策略实施的框架, 并以长沙县为样本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表明, 在当前强调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 区域发展差距会倒逼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升级, 而空间规划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深化推进改革则是地方政府针对区域发展的“空间失灵”问题, 运用“有形之手”进行空间干预的重要方式。在具体发展实践中, 一是要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由“核心—外围”的集聚空间格局向适度集聚的空间经济格局演变; 二是要支持欠发达地区适时进行区域发展类型的“跃迁”或调整; 三是要注意相关公共政策出台的时机以及政策的配套实施问题。

【关键词】: 协调发展; 区域战略; 区域差距; 战略升级; 空间干预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7) 11 - 0046 - 06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11.006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自 1990 年代起, 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展开了持久而广泛的争论, 并形成了趋同、趋异、倒 U 型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诸多理论和流派^[1-2]。后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全球化、内生增长理论、层域理论、城市与区域治理、制度转型、全球性产业重构与转移等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3]。许多学者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与阐释, 如孙兵基于区位中心扩散理论指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4], 覃成林等认为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是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大于其各自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5], 谢安世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区域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问题^[6], 胡星认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发散理论对区域发展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7], 张军、徐现祥等则分别从官员激励角度对中国区域差距的成因进行了理论阐释^[8-9]。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干预范式, 理论界一直未形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 应该实施不考虑空间因素的干预政策, 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等鼓励“人往高处走”, 即空间中性 (Spatially neutral) 政策^[10]; 另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存在政府就应当天然地实施基于地方的干预政策, 以便将“就业机会带给底特律”, 即空间干预 (Spatially-targeted) 政策^[11-13]。也有学者认为应综合以上两种政策的优势组合使用区域政策, 如丁嵩等针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提出, 一方面要逐步消除阻碍区域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 但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实施基于地方的空间干预政策, 促进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潜力的提升^[14]。本文针对区域发展差距问题, 研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的“三角锥”概念模型, 综合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两种范式, 构建

¹ 感谢长沙县相关部门调研协助以及张薇、曾召友博士的资料收集与数据处理工作。

收稿时间: 2017 - 04 - 23; 修回时间: 2017 - 08 - 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7YBA27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2017 年院属重点课题 (17ZHA03)

作者简介: 罗黎平 (1979—), 男, 湖南茶陵人, 博士, 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liping6569@163.com。

起一个理论逻辑分析与策略实施框架。在此框架下，以长沙县为例，重点分析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协调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政府如何通过调整升级区域发展战略，并依托空间规划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深化推进改革等空间干预策略，推动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增强全县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1 区域差距、战略升级与空间干预策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笔者曾提出过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的“三角锥”概念模型。三角锥的顶点是总体战略谋划，往下有三个策略做支撑，即产业发展策略、空间发展策略和改革推进策略（图1）。其中，总体战略谋划是一种概念化的战略，通常是基于区域发展环境、地理区位、城镇布局、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而提炼出的，用以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凝聚力和指引力的发展定位、目标前景或推进路径等。如湖南省提出并实施的“一化三基”、“四化两型”战略，就是发展目标前景和推进路径相结合的总体战略谋划；而株洲市提出的打造中国“动力谷”，则是根据株洲市轨道交通等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提出的总体战略谋划^[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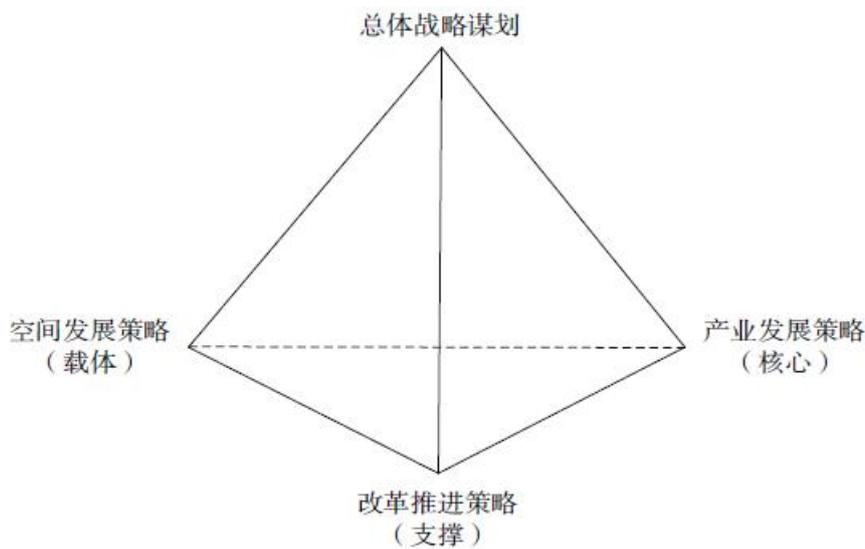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的“三角锥”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Triangle Con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design

就总体战略谋划的三个支撑策略而言，首先，产业发展策略是经济发展战略总体谋划的核心。马克思发展理论认为，生产端或供给侧是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人类经济的进步和一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供给端推动^[16]。现代经济增长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各要素资源配置的实际效果。因此，产业发展策略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策略。如地方政府在设计经济发展战略时，通常会遴选出未来若干年要重点打造的主导产业，这其实就是一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其次，空间是产业发展等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要素的相对区位关系和分布形式即经济空间结构是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经济活动和区位选择的累积结果。经济空间结构是否均衡、合理，不仅影响和决定城市区域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和区域的发展定位^[17]。空间经济结构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在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空间发展主要体现为新城区、新产业园区建设带来的空间拓展以及区域内部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空间的结构优化过程。最后，改革推进策略是产业和空间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和市场化改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18]。改革推进策略实施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消除相关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有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运用以上概念模型，可以综合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两种范式，针对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构建起一个较好的逻辑分析与策略实施框架（图2）。区域发展战略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问题所做的筹划和决策，重点关注发达区域或者欠发达区域本身如何从政策层面来推动其优化或快速发展，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既然如此，在当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差距势必会倒逼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新的战略调整与实施将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空间发展与改革推进这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改革推进策略重点解决空间中性政策中提出的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等鼓励“人往高处走”等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实施区域倾斜发展的重要途径，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税收、投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促进发展要素流向欠发达区域。也就是说，改革推进策略中既包含空间中性政策，也涵盖空间干预政策。而产业发展策略与空间发展策略，则主要解决空间干预政策中提出的将“就业机会带给底特律”的问题，具体通过空间规划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强化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经济联系，提升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增强整个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与均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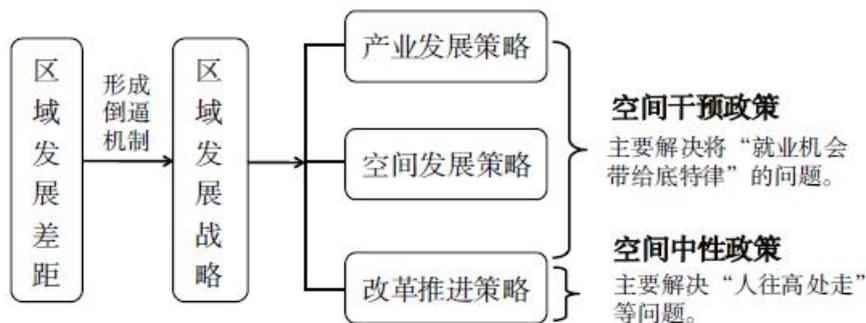


图2 区域差距、发展战略与空间干预策略实施框架
Fig.2 A framework of regional gap, developmental strategy and spatial intervention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2 基于湖南省长沙县的案例分析

2.1 研究对象概况

长沙县毗邻湖南省会长沙市，从东、南、北三面环绕长沙市区，总面积1 756 km²，下辖18个乡镇（街道），总人口92万。2016年，完成GDP 1 280.3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排名中，分别跃居第7位、第6位，继续领跑中西部，获评“2016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根据地理位置与功能分工，长沙县北部区域具体包括金井、高桥、路口、春华、开慧、青山铺、北山、果园、福临等9个农业生态型乡镇，南部区域具体包括星沙、湘龙、泉塘、长龙、榔梨等5个城市服务型街道以及黄兴、江背、黄花、安沙等4个工业和综合发展型街镇，南北分别有9个乡镇（街道）。

2.2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的第一次战略升级及空间干预策略

自1990年代末开始，长沙县实施了“兴工强县”战略。在该战略的指引与带动下，长沙县始终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工业领域和工业园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到2007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7.9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163.4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1%，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位列第45位，2008年更是上升至第37位，名列中

部地区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部“第一县”。

表1 “南工北农”战略的空间干预策略

空间干预策略	针对的主要问题	空间干预的具体措施
空间发展策略	在“兴工强县”战略指引下，北部各乡镇竞相建设乡镇工业园，大力发展工业，但大部分乡镇的工业园区并未发展起来，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农业又没有被当做发展的重点，结果造成南北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将全县乡镇（街道）划分为县城及经开区服务区域、工业优势区域、农业优势区域和工农综合发展区域，实施区域分类发展；捞刀河以北乡镇整体规划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区；积极推进城乡空间布局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住房建设一体化。
产业发展策略		着力打造“一区七园”工业园区，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出台《鼓励现代农业投资暂行办法》，实施现代农业发展的“2571”工程；积极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
改革推进策略		确定“3568”乡镇发展绩效分类考核办法；积极推进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

在“兴工强县”战略指引下，北部各乡镇也竞相建设乡镇工业园，大力发展工业，可是经过几年后北部大部分乡镇的工业园区并未发展起来，而北部乡镇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又没有被当做发展的重点，结果造成南北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全县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趋明显。以乡镇财政收入为例，具体表现为：一是南北差异大，2007年南部乡镇财政收入是43 512万元，北部乡镇是11 416万元，南部是北部的4倍左右；二是近远郊不同乡镇差距大，2007年近郊的榔梨镇财政收入11 224万元，远郊双江镇为150万元，两者相差达到74倍。针对县域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2008年长沙县实施了第一次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升级，由“兴工强县”升级到“南工北农”战略，同时为配合“南工北农”战略的实施，全面推动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了“三个共同”的发展理念（即幸福与经济共同增长、乡村与城市共同繁荣、生态宜居与发展建设共同推进），从空间发展、产业发展以及改革推进三个方面采取了具体措施（表2）。

表2 “南工北农”战略实施以来长沙县南北部乡镇年度财政支出和总收入变化情况

指标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南部乡镇财政支出S（万元）	25 029	14 471	23 556	21 375	28 244	39 747	36 613	53 907
北部乡镇财政支出N（万元）	10 724	10 364	15 341	19 210	27 918	23 269	38 075	41 990
二者比值N/S	0.43	0.72	0.65	0.9	0.99	0.59	1.04	0.78
南部乡镇财政总收入S（万元）	281 920	343 899	459 335	779 730	861 338	949 197	1 065 827	1 202 785

北部乡镇财政总收入 N (万元)	10 283	12 659	6 446	6 981	8 781	10 430	9 902	8 199
二者比值 N/S	0.036	0.037	0.014	0.009	0.01	0.011	0.009	0.007

注：数据来源于 2008—2015 年的《长沙县统计年鉴》。表 3 同。

长沙县“南工北农”战略实施几年来，由于政府的空间干预，给北部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四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北部乡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快速增长，由 2008 年的 12.36 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12.76 亿元，8 年累计投资 408.72 亿元，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 37.14%。二是北部乡镇财政支出实现快速增长，由 2008 年的 10.72 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41.99 亿元，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 21.53%，南北乡镇财政支出比值也由 2008 年的 0.43 提高至 2015 年的 0.78，乡镇财政支出的南北差距明显缩小（表 3）。三是现代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 10 万亩百里茶廊产业带、34 万亩超级稻和优质稻产业带以及 1 万亩特色小水果花木走廊，拥有“金井”、“好韵味”等 18 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富甲”、“星香”等 12 个品牌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3 家茶叶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四是北部乡镇农村居民的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全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 2008 年的 2.14 下降至 2015 年的 1.45（表 3）^②。

表 3 “南工北农”战略实施以来长沙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情况

指标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C (元)	16 887	18 575	21 099	24 118	27 398	30 548	33 513	36 642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R (元)	7 885	9 340	11 946	14 237	15 948	20 786	22 872	25 207
二者比值 C/R	2.14	1.99	1.77	1.69	1.72	1.47	1.47	1.45

2.3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的第二次战略升级及空间干预策略

“南工北农”战略及相关空间干预策略虽然使北部乡镇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居民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并没有缩小长沙县南北区域乡镇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南北部乡镇的年度财政总收入为例，2008 年长沙县北部乡镇财政总收入为南部乡镇的 3.6%，在随后的 7 年时间里，这个比值一直呈下降趋势，到 2015 年北部乡镇财政总收入仅为南部乡镇的 0.7%，南北部乡镇经济发展差距呈快速扩大趋势（表 2）。

这种南北差距与统筹城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目标与要求不相适应。于是，2016 年 8 月长沙县第十三届党代会提出了“强南富北、民生立县”的战略部署，全县总体发展战略要实现由“南工北农”向“强南富北”的升级与转变，并强调要持续推动发展重心北移，切实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就具体的空间干预目标而言，北部乡镇在目前县域南北

² ① 现有统计口径只有全县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但北部乡镇的农村居民数量占到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大多数，因此全县农村居民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北部乡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发展基础与条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的前提下，要实现由“北农”转向“富北”，势必需要把全县发展的重心向北部转移，除了在民生领域继续向北部地区倾斜外，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增强北部乡镇的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强南富北”战略针对北部乡镇发展最主要的空间干预策略是计划在北部乡镇，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新示范为主题，打造一个约 20 km²的北部产业园，试图通过园区建设促进县域南北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平衡，进而推动实现北部乡镇产业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表 4）。

表 4 “强南富北”战略针对北部乡镇发展的空间干预策略

空间干预策略	针对的主要问题	空间干预的具体措施
空间发展策略	北部乡镇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规模不大，乡村旅游业也刚刚起步，这种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构成导致南北区域财政收入差距地持续扩大。	在北部乡镇的黄兴大道（东八线）以东，北横线以北，规划建设一个约 20 km ² 的北部产业园。将北部产业园打造成为集农产品生产与精深加工、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研发服务、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示范园区；以北部产业园的建设与发展带动资本、技术、人才、市场需求在北部乡镇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示范引领北部乡镇各类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
产业发展策略		
改革推进策略		继续推进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深化投融资领域改革试点，重点推进园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 PPP 项目。

3 长沙县案例的经验总结与政策启示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发展要素向少数几个地方集聚，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亦即所谓的“空间失灵”问题。本文构建并运用“发展差距、区域战略与空间干预的逻辑分析与策略实施框架”，对湖南省长沙县南北区域发展的“空间失灵”问题以及政府采取的空间干预策略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当前强调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发展差距会倒逼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升级，而空间规划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深化推进改革则是地方政府针对区域发展的“空间失灵”问题，运用“有形之手”进行空间干预的重要方式。虽然长沙县第二次空间干预策略实施的实际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但长沙县的发展实践可为当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和政策启示。

第一，“核心—外围”空间经济格局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推动区域经济空间向新经济地理学扩展模型所展示的适度集聚空间经济格局演变，同时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须把握好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时序和节奏。

长沙县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与建设，在空间上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典型的“核心（新沙街道为主的南部街镇）—外围（北部乡镇）”的空间经济格局，这种空间经济格局是造成长沙县南北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这种核心—外围的经济空间格局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因此，具有类似这种经济空间格局特征的经济区域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首要是促使经济空间向新经济地理学扩展模型所展示的适度集聚空间经济格局演变，通过实施长效型的区域空间格局优化政策满足相关区域的长期利益诉求或发展诉求^[19]。而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由于一个经济区域可动用的经济发展资源有限，因而必须把握好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时序与节奏，初期可以在欠发达地区选择关键区域进行重点开发，如长沙县选择在路口镇建设北部产业园，试图把这个“点”打造成为带动其它欠发达乡镇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而不是像 1990 年代所有北部乡镇全面铺开建设工业园。

第二，区域产业分工的固化会进一步固化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等。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可以支持欠发达区域实现区域发展类型的“跃迁”或调整，不应静态地恪守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原则与区域分类发展原则。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方向选择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如果从发展的自然禀赋条件以及自然环境承载力看，其实长沙县南北区域差别并不大，长沙县分类发展的区域划分原则依据更多的是区域过去发展水平的一个事后承认或被动承认。换句话说，当前北部乡镇不是不能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只是在“兴工强县”战略时期丧失或者说没有把握好工业发展的机遇，当这种发展的机遇窗口期错过以后，与南部乡镇相比，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表现得越来越弱。从我国各产业的税收创造能力看，第二、第三产业是我国当前税收的主要承担者，第一产业无论是宏观税负还是税收协调系数都微乎其微，可以说，区域之间产业构成的差异就已经决定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可以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发展类型的“跃迁”或调整（如长沙县应支持北部乡镇的区域发展类型由农业优势区域逐步向工农综合区域类型“跃迁”），而不应静态地恪守产业比较优势与分类发展原则，因为固化的产业发展分工会进一步固化了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等。

第三，旨在矫正市场失灵的公共政策会对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甚至与公共政策的目标相违背。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把握好相关公共政策出台的时机并注意相关政策的配套实施问题。

长沙县针对“兴工强县”战略造成的南部区域发展差距所采取的第一次战略升级（“南工北农”战略）及空间干预策略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即“分类指导、统筹发展”。目标是遵循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规律，通过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带动北部乡镇经济发展。这样一项战略措施或者政策对南部乡镇与北部乡镇带来的发展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果是南北部乡镇经济发展差距呈快速扩大趋势。这表明，在实践中那些旨在矫正市场失灵的公共政策会对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甚至与政策的目标相违背。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对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影响存在非均质性以及各种政策的时空效应存在非线性，因此，我们需通过政策间动态协调寻找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优时空路径^[20]，重点要注意公共政策出台的时机以及与相关政策的配套实施问题。虽然“南工北农”战略实施的时机与效果值得进一步商榷，但长沙县在出台“南工北农”战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公共政策配套实施的问题。如当时长沙县政府配合“南工北农”战略，同时推进了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为主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不断改善北部乡镇的发展基础条件以及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样做的好处在突出发展本地优势产业的同时，不断改善欠发达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避免欠发达地区再次丧失赶超发展的机会，陷入发展的“要素缺失陷阱”。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须注意公共政策出台的时机以及相关政策的配套实施问题，因为如果时机不成熟或相关配套政策和支撑条件跟不上，非但不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反而会扩大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1] Maxwell P, Hite J C. The Recent Divergence of Regional Per Capital Incomes [J]. Growth and Change, 1992, 23: 37 - 53.

[2] Barro R,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3] 陈培阳, 朱喜钢. 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的空间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1, 31(8): 1 252 - 1 257.

[4] 孙兵.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1, 30(1): 1 - 4.

[5] 覃成林, 张华, 张技辉.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及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测度及其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0): 37 - 45.

-
- [6] 谢安世.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理论根源与对策思路 [J]. 理论月刊, 2017(3): 141 - 148.
- [7] 胡星. 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理论和现实思考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7(4): 57 - 60.
- [8] 张军, 高远. 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 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07(11): 91 - 103.
- [9] 徐现祥, 王贤彬, 高元骅.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1(3): 26 - 58.
- [10] Barca F, P McCann, A Rodríguez-Pose. The Cas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Place- Based versus Place- Neutral Approache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2, 52(1): 134 - 152.
- [11] Martin R, P Sunley.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olicy Relev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357 - 369.
- [12] Hewings G J D. Spatially Blind Trade and Fiscal Impac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es [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4, 54(4): 590 - 602.
- [13] Neumark, D. and H. Simpson. Place- Based Policies [R]. NBER Working Papers W20049, 2014.
- [14] 丁嵩, 孙斌栋. 区域政策重塑了经济地理吗?——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的视角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11): 56 - 65.
- [15] 罗黎平. 均衡发展的三个维度与县域经济走向 [J]. 改革, 2015(2): 91 - 97.
- [16] 李义平.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个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1): 13 - 21.
- [17] 吴向鹏. 市域经济空间结构: 理论、演化与优化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6(6): 18 - 22.
- [18] 马力宏. 制度供给与经济发展——兼论“浙江现象”中的政府因素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6): 79 - 84.
- [19] 刘安国, 张越, 张英奎. 新经济地理学扩展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11): 184 - 190.